

# 第一章 四川藏族价值观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就一个民族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而言，要受到它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等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同其他一切民族一样，藏族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也总是基于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物质文化条件。换句话说，藏族价值观是藏族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制约、主导自身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社会基本准则。

## 第一节 自然地理条件及四川藏族的先民

各民族的价值观念，从本质上讲反映的是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地缘文化的存在，最直接地证实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差异。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类的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会呈现不同的特征。正如摩尔根所说：“东半球和西半球处于同一个阶段的文化无疑地存在着差异，其原因在两个大陆的自然资

源有所不同。”<sup>①</sup>像黑格尔、希波克拉特、汤因比这样一些大思想家，也都不否认地理环境对社会文明和价值观形成的作用。正如希腊文明只能诞生在地中海沿岸，中华文明只能诞生在黄河流域一样，包括四川在内的整个藏族文明及藏民族的价值观念就只能诞生在青藏雪域高原。

### 一、四川藏族生活的自然地理条件

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南部以及云南西北部。从地理环境看，藏族主要生息繁衍在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大高原。这里山脉众多，河湖遍布，道路险峻，气候恶劣。

这里著名的高山有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尔金山、祁连山、邛崃山、横断山等，其中海拔在 7000 米以上的雪山就有 16 座。山脉呈东西和南北走向。青藏高原的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没有绝对的无霜期，大风天气普遍达 120 ~ 200 天。藏族称自己居住的土地为“十万雪山，十万江河”。

处于青藏高原南边巍峨蜿蜒的是世界上闻名的喜马拉雅山脉，全长 2400 公里，有二三百公里之宽。主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达 8848.13 米，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峰。有名的昆仑山系则挺立在青藏高原的北方，呈由西向东走向，平均海拔有 5000 ~ 6000 米；而从新疆和克什米尔交界处延伸而来的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脉，则呈东西走向横卧在青藏高原的东北，其海拔平均在 6000 米以上；庞大的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脉，纵横昂立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平均海拔也在 5000 米以上；在

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则是由一系列平行的南北走向的山系构成，横断山脉、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芒康山脉等耸立其间，海拔也都在 4000 ~ 5000 米左右。由于这里地势较低，形成了一道道东西南北的大峡谷；在青藏高原中，地势较低的是处于东部的横断山脉地区，那里的平均海拔只有 2000 米左右。

青藏高原上这些昂首矗立的大山高峰，由于终年白雪堆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固体水库。每当夏季到来，消融的冰雪奔向东南，在途中汇集成无数的江河，造成无数个湖泊。亚洲和中国的许多著名的河流如湄公河、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等都发源在这里。

从气候上看，由于青藏高原群山耸立，平均海拔居于世界之首，且地势呈西北高、东南较低的态势，这就决定了青藏高原西北严寒干燥，东南温暖湿润的固有的气候特征。从东南向西北依次呈现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亚寒带——寒带；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更替的带状分布，植被随着气候的影响由东南向西北呈现出森林——灌木草甸——草原——荒漠的带状分布的特点。西藏东南部地区和甘、青、川横断山脉谷地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富，这里分布着我国第二大林区的横断山脉林区和第三大林区的西藏林区。西藏北部、甘肃南部和青海大部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是我国四大草原之一。<sup>①</sup>

达尔文认为，太恶劣和太优裕的地理条件都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化。黑格尔也认为，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作自由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自己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第 35 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建筑一个世界。如果按照这两位大家的理论，藏民族能够在自然地理环境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更不用说创造灿烂的文化和“推进人类的文明”了。

其实，青藏高原的隆起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这一长久的过程，当然不可能在人类一代或者数代的时间内完成。换句话说，人类对青藏高原的适应是伴随着青藏高原自身的隆起这一过程来完成的，尽管青藏高原地质变化的过程远比人类本身的历史还要久远得多。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的考察认为，即使是喜马拉雅山地区，在七八百万年前海拔也不过 3000 米左右。而达到现在的高度“还是从最近四百万年以来快速上升的结果”。而据考古发现，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历史至少有七八百万年了。即使藏民族的先民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历史没有这样长，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藏民族最早的先民生息繁衍在青藏高原时，那个时候青藏高原的海拔及气候远不会是今天这般恶劣的模样。而且，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海拔更低得多，其气候条件也更适宜人们生存。而后来的千百代藏族子孙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也早就渐渐适应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当环境条件越来越恶劣时，人们发现他们已经无法脱离这片土地去异地发展，他们的体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和这块高原融为一体，深深扎根，有了适应性，只能在这块高原奋斗、繁衍。

四川藏族主要生活在川西北和川西地区。而这一地区在地质构造上仍然属于世界上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的一部分。青藏高原不仅是整个藏民族的生息繁衍之地，也是四川藏族的生活摇篮。四川藏族地区的地貌主要有高原、高山、高山峡谷三大类型。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交错接触带。北部与青海、甘肃省相邻，四川藏族最集中的甘孜、阿坝地区平均海拔在 3000 至 4000 米以上，是四川地势最高的部分，这一区域内的地表相对高差却不大，除东至 4000 米以

上，是四川地势最高的部分，这一区域内的地表相对高差却不大，除东南部超过 200 至 500 米外，在红原、若尔盖、石渠、色达等地区只有 50 米至 100 米左右，多为矮山和宽谷相间分布，高原面保持完整。这一片地区河谷幽深，河流众多，著名的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这里由于地势低陷，阶地宽广，曲流迂回，造成排水不畅，形成大面积的沼泽地，我国第二大沼泽就在四川藏族地区的若尔盖。这一地区山峰高耸，山脉陡峭，著名的山脉贡嘎山、格聂山、四姑娘山、雀儿山等大都在海拔 6000 米以上。按四川藏族的说法“爬上这些山，鞭子打着天”。这里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尤其是 5000 米以上的山岭，终年积雪，冰川景观千姿百态。四川藏族地区的气候属高原型季风气候，复杂多样，地域差异十分显著。比如四川甘孜藏族地区就南北纵跨六个纬度区，随着纬度的自南向北延伸，气温逐渐降低，在六个纬距范围内，最南纬度区和最北纬度区内的平均气温相差 17 摄氏度以上。在高山峡谷地区，由于山脚和山顶高差悬殊，气候也随着高度变化，气温差异就更加明显，达 20~30 摄氏度。

任何文化都是特定环境的文化，环境改造人，塑造人，同时也改造、塑造、限定着特定的文化形式。四川藏民族生活在这样高的海拔，这样恶劣的生态环境下，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与其他藏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藏族文化。也正是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四川藏族人民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民族特质。不仅如此，四川的藏族同胞生活在这山水冰雪交融的高海拔环境之中，还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形象、性格和审美意趣。四川藏族同胞崇拜白色，就是由冰雪孕育的一种民族性。四川藏族长期生活在“雪域”的环境之中，在那里，一年中有相当漫长的时间白雪覆盖着大地，那终年不化雪的贡嘎山、格聂山等，更是作为圣山仙景伴随着四川每个藏族同胞

的一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圣洁的白色，便从小就深藏在人们的心底里，熔铸在灵魂之中。而藏民族饲养的耐寒的绵羊，那白色的羊毛也被视作吉祥物沉淀在藏民族的意识与观念之中。当然，也就人说，藏民族崇尚白色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藏民族早期的日、月、火、光等崇拜，因为日月火光等都与白色有直接联系。此外，也不排除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印度佛教中白色同样是高贵的颜色。<sup>①</sup> 所以，四川藏族喜欢白色，无论在隆重的纪念节日上，还是在平时对尊贵的客人，他们都喜欢将雪白的哈达作为重要的礼仪用品来表达自己的良好祝愿与情感。

## 二、四川藏族的先民

藏民族主要生活在祖国西部边疆地区。这一分布状况，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吐蕃和居住在祖国西部边疆的各民族，其中主要是和古代羌人诸部长期交错杂居，相互自然融合，共同发展的结果。<sup>②</sup> 四川藏族是整个藏民族的一部分，要寻找四川藏族的先民，首先必须从整个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说起。

关于藏族的起源，在藏族古老的传说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世界最初从五种本原物质中产生出了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他与从海面的气泡碎裂时产生的女人曲坚木杰莫结合，生下了九个兄弟、九个姐妹。九兄弟分生出九个女伴作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第5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卡尔梅：《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意义》，向红笏、陈庆英译，载《藏族研究译文集》（1），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1983。

为他们的妻子，九姐妹也分身出九个男子作为她们的丈夫，由他们繁衍出苯教的众神和人类。从黑色的卵中生出闷巴塞敦那波，他从自己的影子里衍生出顿辛那莫，由于他们的结合生下了八个兄弟、八个姐妹。这八兄弟、八姐妹又有他们的丈夫和妻子，由他们繁衍出苯教的恶魔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有善人也有恶人。善良的好人是居多的。人类善良的好人就是从什巴桑奔波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的。①

另一种传说则认为，藏族是由一只猕猴与居住在深山岩洞中的一个罗刹女结合为夫妇，生下六个子女后逐渐繁衍形成的。这六个子女生下来后，被他们的父猴送到叫做甲错森林的水果丰盛的地方。过了三年，老猕猴再去看望他们时，发现他们已经繁衍成五百多只猴子，因为食品不够，都饿得饥肠辘辘，“叽叽”悲啼。老猴见状，心里十分悲伤，四处寻找食物，经观世音菩萨点拨，他终于发现一条川里长满野生谷类。就带着他的子女们去饱食谷物，这些子女们吃了谷物后，身上的毛渐渐短了，尾巴也逐渐消失了，以后又慢慢懂得使用语言，由此变成了人类。② 这样的传说，在《贤者喜宴》等藏文史料中都有记载。在西藏和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四省区的藏族地区，更是广为流传，影响深远。③

神话传说虽然不足为证，但是，这些传说至少说明在远古的青藏高原，藏族先民很早就生活在那里了。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世》，刘立千译注，第 30~32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第 1~2 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2、3)。1958。

早在 17、18 世纪，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开始陆续进入青藏高原腹地，进行探险，同时试图考察藏族的起源。他们在藏族居住的一些地区发现了石器时代的遗物、遗址。但他们主要搜集的是地表文物，限于条件，未能判定出石器的具体年代，未能找到最早的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生存的直接证据。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藏族人种不可能直接在青藏高原产生和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专门的研究队伍，进行了多学科的大规模科学考察。在西藏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了中、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古代人骨、墓葬。根据考古发现，青藏高原从远古的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1956 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西藏的那曲和青海长江源头等地，发现了十几件旧石器时代的打击石器。<sup>①</sup> 1958 年，在西藏林芝县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会合处东北岸，也发现了古代人类头骨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在这之后，我国考古人员又先后在西藏的聂拉木、定日、申札、双湖、日土、普兰、吉隆、墨脱、昌都卡诺村、拉萨北郊，以及青海有关藏区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细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陶器等。这些石器除了在外形上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同类石器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外，更具有本地区的特点。从西藏及其他藏区发现大量旧石器和细石器来看，说明青藏高原早在一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其中，1978 年在西藏昌都地区卡若村附近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卡若村位于澜沧江西岸，海拔约 3100 米。据估计，卡若遗址占地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在前后两次的发掘中，共出土房屋基址 29 处，石器文物 7978 件、骨器 368 件、石片 2 万多块，其中能够拼凑的 46 件。经过科学测定，此遗址距

尔藏才旦编著：《史前社会与格萨尔时代》，第 4 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

今大约四千六百余年；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随着西藏地区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证明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在西藏土地上早就有形成并发展为人类的民族，藏族是由此形成的，藏族的祖先很早就青藏高原上用自己的双手开拓了这片富饶的土地，他们是青藏高原的主人。

有学者认为，在昌都地区的卡若一带发现藏族先民存在的事实，至少可以把藏族的文明史提前到距今 5000 年前<sup>①</sup>（以前发现的大量旧石器、细石器等，均为地面采集物，无确切年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过去认为青藏高原不适于古代人类居住的说法就是没有根据的，从而可以彻底否定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西藏民族种外来说”的错误观点。事实上，卡若遗址位于青藏高原的东部，这里由于在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中，形成了较低的地势，地理和气候条件较其他青藏高原地区优越。正是这种地理和气候等较适宜的环境，使得藏民族能够生存繁衍，能够进行农耕和畜牧业生产，也就能够产生卡若文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古藏民族的大量墓地（比如相皮墓地、林芝五处地点和红光三队墓地、杜布墓地、曲贡遗址、曲贡墓葬、普努力沟墓群等）得到发掘，大量的考古发现，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藏族先民的经济生活和价值取向，“为藏文字出现前高原史前文化的面貌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除了墓地，散布在青海各地的岩画也证明，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有着羌人、戎人的活动，他们创造的人类文化，不仅是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组成，他们本身也是藏族远

① 尕藏才旦编著：《史前社会与格萨尔时代》，第 17 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

古祖先的一部分。<sup>①</sup>这在藏汉古籍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支持的材料。古时，汉文献对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诸部族大都称为“西羌”。《后汉书·西羌传》说，秦献公“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刃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之后，西迁的一部分羌人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出现了许多种落。《新唐书·吐蕃上》也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鹑提悉勃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

藏文文献关于藏族先民的记载也比较多，只是这些文献由于后人的追述，其中有许多神话传说和想象。不过，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生活、生产的影子。如《总遗训》载：“初始有六猴雏，俟后繁衍众多，分为四部，并彼此发生争执，此即所谓西藏之四种人：斯、穆、桐、冬等四种血统，另外增加查、楚等，谓之六人种。”其实这六种人，也就是六个较大的部落，他们分别住在雅隆河谷的索塘、泽塘、沃卡久塘、赤塘等地，平时到森林采集食物，食自然之谷物，穿树叶之衣，过着原始生活。据说至今当地的藏族居民，仍能指出山崖上的某些洞穴为其先民的遗址。<sup>②</sup>这些部落后来又分衍出更多的部落，据载最初有 40 小邦 随后是 12 小邦 主要有悉补野、羊同、工域、达域等。这些小部落之间不断争斗，不断兼并，最后由悉补野部落挂帅，统一各部形成部落联盟，其部落联盟首领被推为“赞普（英武之王）史称“聂墀赞普”这是吐蕃先民中的第一位赞普，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4 世纪中叶。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第 11~12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sup>②</sup> 《四川百科全书》，第 1110 页，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

从考古发掘和汉藏文献的记载可以发现，藏族先民起源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带，在数千年或上万年以前在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已发展起定居农业和家畜驯化饲养，形成了若干个势力强大的部落联盟，建立和发展了一套部落和氏族制度，与之相适应出现了古代藏族先民的姓氏。到吐蕃王朝兴起前夕，藏族先民部落经过数千年的迁徙发展和分化组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数十个部落联盟。

四川藏族主要聚居在四川西部横断山脉地区和四川西北高原地区。因居住地不同，四川境内的藏族有不同的称谓，川西北藏族牧区的藏族自称为“安多（哇）”，川西部地区的藏族自称为“康巴”，四川阿坝南部和甘孜东部的部分农区的藏族则自称“哥邻”或“嘉戎（哇）”。远在旧、新石器时代，四川藏族地区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流域就有人类活动。解放后，在炉霍县关门石就发现有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存，在丹巴县罕格依村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来的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粟粒、装饰品、房建遗迹等，证明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在今天的四川藏族地区就有人类在那里定居、生产，繁衍生息。相传在夏朝（公元前 2140 年）建立前后，在今天的甘孜、阿坝地区是蜀族活动的地方，属《禹贡》梁州之域。夏、商、周时代，属华夏各诸侯封地外的方国部落。春秋时期，古藏民族的先人一支西迁到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山区，与甘孜、阿坝境内的原始先民相互融合，成为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藏族先民“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分散为部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公元前 310 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统一巴蜀，置蜀郡，在岷江上游设置游氏道。秦末汉初，在岷江上游两岸，土著居民就已经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从游牧渐而转向定居，逐渐形成部落联盟。《资治通

鉴》唐贞元九年（793年）中记载的“剑南西山诸羌”，指的就是当时四川境内的众多部落。如汉代时，在今四川阿坝地区有“冉”等部落，在今四川甘孜州南部有白狼等部落，今四川平武县境有白马部落。到了6、7世纪又演化为“西山八国”各部。隋末唐初，即7世纪初叶，西藏山南的雅隆部落壮大，并向东扩展，逐步统一并巩固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其后，不断对外发展，四川、甘肃、青海等诸羌部落逐步与之融合。据史料记载，在今天四川境内被吐蕃征服统一的土著居民有“党项”、“嘉良”、“白狗”、“哥邻”和其他一些古代称之为“羌”、“氏”、“夷”的部落，并在这些地区安置大批吐蕃守军和随迁的居民，与当地各部落杂处。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韦·科协列东在甘孜、昌都一带举行起义，引发了吐蕃全境农奴大暴动。吐蕃王室的4个王系和地方僧俗封建势力各霸一方，形成四分五裂不相统属的混乱状态，原吐蕃境内的各个部落实际上已经各自为政。吐蕃王朝崩溃后，这些地方的军事首领和长官便各据一方，成了当地的世袭土官。这些地区，主要以宗教文化为中心的吐蕃文化，维系着彼此间的密切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那些吐蕃官兵和随迁而来的居民，与今天四川甘孜、阿坝等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同化，逐渐形成今天四川境内的藏族。

在元、明、清时期，四川藏区分别受到中央王朝分封的土司统治。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藏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但清朝的迅速崩溃，流官制度未能巩固，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被废除。

元、明、清时期，四川藏区分别受到中央王朝分封的土司统治。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藏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但清朝的迅速崩溃，流官制度未能巩固，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被废除。

## 第二节 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

从现象上看，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的现实状态，受到这个民族的主体心理、思维方式的现实状态以及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历史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深层的角度看，这些因素也都基于这个民族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生活方式的历史基础。因为，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确定的内容，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生产关系和历史文化条件的制约。从根本上说，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价值观的现实社会存在，因此，藏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变化，也直接地影响和决定着包括四川藏族在内的广大藏族的价值取向。

### 一、四川藏族地区的经济

价值观念的产生是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对自身认识升华的结晶。

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人类价值观念的转变，价值观的内涵总是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而不断丰富。这一过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四川藏族价值观的形成与变化也验证了这一必然规律。

四川藏族地区尽管地处青藏高原，地理和气候条件独特。但境内有着优质的天然草场和大片森林，包括杉、松、桦、杨等在内的珍贵树种众多，而且盛产虫草、贝母、天麻、党参、黄芪、麝香、鹿茸、熊胆等名贵药材。地下矿产也十分丰富，具有优势的矿产有铀、锂、金、硅、铁、锰等近百种矿产。正是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四川藏族先民曾经创造了发达

的高原农牧业文明。

牧业方面，在殷商以前，四川藏族就已经把野生的大角盘羊驯养成了家畜，最后改良为藏绵羊。又比如牦牛，原是羌塘地区土产的一种野牛，后来经过藏族先民驯养成为即能力役又能肉用的耐寒家畜，被誉为“高原之舟”。牦牛至今仍是四川藏族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仅如此，四川藏族先民还创造了高原农耕文明，尤其是他们将原是野生燕麦的植物，培育为适应性广、耐寒、耐低温、抗旱性强、产量高、营养丰富的麦类作物青稞，充分显示了四川藏族先民的勤劳和智慧。

在秦以前，四川藏族的古代先民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的原始游牧生活，基本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汉武帝时，“开西南夷”，打通牦牛道，与当时被称之为徼外的藏区建立政治与经济往来。当时四川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渗入，对四川藏区生产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汉代到隋代期间，由于农业的发展，促使更多的居民定居生活，由此形成了一些较大的部落联盟。唐宋以后，四川汉区与藏区发展“茶马互市”，大大地刺激了四川藏区商品交换，促进了当地的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由于四川藏族居住在高原地区，其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四川藏族在解放之前，几乎没有纯农业部落，主要是单纯的畜牧业经济。仅有的小块农业区也是半农牧区，或以牧为主兼有少量农业，或以农业为主兼有少量畜牧业，而且其中多数还是牧业多农业少。这是基于高寒、游牧、部落三位一体而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经济结构。

不过，也正是由于地处高寒地带，四川藏区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在四川藏族地区饲养的牲畜中，基本上是可以耐寒的马、牛、羊三种，其中黄牛只有

少数贫苦牧民饲养，猪和鸡及其他家畜家禽则几乎无人饲养。除了马、牛、羊外，骆驼、骡子因驮运力强，在四川个别藏族地区的牧主们也饲养了一些。在四川藏族地区，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对牲畜的饲养和对畜产品的利用，构成了四川藏族地区特有的畜牧业经济形态，牧民的衣、食、住、行都来之于牲畜和畜产品。当然，由于四川藏族地区地域辽阔，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海拔高、气温低、自然灾害多。一些地区常常干旱，牧草返青晚，长势不好，加上经常性的冬季刮大风，降大雪，牲畜的体质瘦弱。如果出现气候异常变化，极易出现牲畜瘟疫，造成大批死亡。而且，牲畜须臾离不开人的管理。一旦放牧人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发生出现牲畜被野兽咬死或跌入河中溺死、掉下悬崖摔死、甚至被大风刮走等情况。这些反映出四川藏族地区畜牧业经济的脆弱性和极不稳定性。尤其在解放前，四川藏族地区生产力低下，畜牧业经济的这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现象更加突出。即或在风调雨顺好的好年头，成畜的死亡比率也在 10% 左右。

在近代，在四川藏族部落社会中，有很多方面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的色彩，处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的阶段，其土地所有制也就具有两重性，即既有公有的成分，也有私有的成分。就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四川藏族地区的土地所有制也还存在这种两重性。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的恶劣，一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与其他民族一样，处于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迫使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生产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如果有人试图离开部落组织，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在远古的时代，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到了近代，四川藏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并未发生特别的变化，这就使得土地公有制度继续存在

仍有可能；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在客观上又需要一定的能由家庭自主的土地，比如割草地、幼畜地等等。这样，草场的私人占有现象便应运而生，反映了藏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四川若尔盖的牧民仍然还是这样一种认识：“草场是部落的，不是土官的。”这就说明在藏族牧民中草场不是私有财产，而是部落公用的土地的观念是非常牢固的。因此，在分配草场，调解草山纠纷时，也不可能是某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当时的头人负责召集有关人员共同协商处置，可见头人也不认为草场完全是他个人的，而是部落的公有财产。这种草场为部落公有的观念在四川藏族地区各部落牧民中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在草场不太宽裕的藏族部落，一般都要定期对草场进行分配。分配的方式当然因地制宜，主要有按季节分配、一次性分配、或一次性分配与季节分配相结合。无论是哪一种分配方式，藏族牧民所得到的只能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头人和一般牧民一样都要参加分配，所得到的也是草场的使用权。即使是容易造成错觉的一次性分配之后，无论牧民对某一块草场连续使用时间多久，它仍然是部落的公共财产，部落既然有分配草场的权力，也就拥有将草场收回的权力，违反部落法规情节严重的就要没收草山。

新中国建立以后，四川藏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和经济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在党的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关心帮助下，四川藏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经过民主改革，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和发展。四川藏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农业生产开始向机械化发展，农牧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持续增长，绝大多数藏族群众摆脱了贫困，一部分藏族群众还过上了小康生活。现在，四川藏族地区在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基础上，已经拥有电

力、采矿、水泥、制革、机修、毛纺、食品、建材、印刷等现代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具有四川藏族地区特色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藏族地区，公路四通八达，彻底改变了过去人背马驮跋山涉水的落后状况。日益便捷的交通运输，有力地促进了四川藏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帮助四川藏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党和国家确定了让农牧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尽快富裕起来的任务和目标，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和特殊照顾。各地和各单位还通过对口支援的方式，帮助四川藏族地区共同发展。这些，闪耀着民族大团结的光辉，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成为四川藏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总而言之，从过去到今天，四川藏族地区这些特有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历史条件，对无数代的藏族同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由此，逐渐地形成了他们与其他民族不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经由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影响，也便成为四川藏族同胞固有的特质的一部分。

## 二、四川藏族地区的宗教与习俗文化

人类社会文明不仅体现在有形的物质文化形态上，它也表现在无形的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礼仪、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知识、技能、科学的理论、艺术的构思、哲学的体系等反映其特有民族文化精神的形式之中。它们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载体，反映了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各民族价值体系的内容，反映了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各民族对客观世界和人生的价值判断，并且一起构成了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特有的价值世界。它们虽然都是人创造的，但反过来又作为人类的文化直接间接地影响、改造着人。当产生这些精神形式的社会形态成为历史时，它们都以各民族的传统文物的形式被继承和保留下